

語絲第一五四期

一九二七年十月廿二日出版

唱新詩等等

佩弦

近年來新詩的氣象頗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寫新詩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雜誌上；在那裏面，我叙述新詩的歷史，並略說明暫時的冷落，未必即是制新詩的致命。下篇本定申說這後一層意見；但這要說到將來的事，而且近於立「保單」，未免使我為難。所以躊躇着，終於不會下筆。

有一回和平伯談及，他說從前詩詞曲的遞變，都是跟着通行的樂曲走的。如絕句的歌唱有了泛聲，後人填以實字，便成爲詞，就是一例。先有樂曲的改變，然後才有詩（廣義的）體的改變。至於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所說的「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故遁而作他體」，還是第二因。平伯說將專寫一書論此事。他又說新詩的冷落，沒有樂曲的基礎，怕是致命傷。若不從這方面着眼，這「冷落」許不是「暫

時」的。

我想平伯的話不錯。但我很奇怪，皮黃代崑曲而興，爲時已久，爲什麼不會給詩體以新的影響？若說俚鄙之詞，出於伶工之手，爲文人所不屑道，那麼，詞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樣，何以會成爲文學的正體呢？我不能想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或者皮黃文句太單調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牠們有新體詩的資格吧？據我所記得的，只有錢玄同先生，在從前的新青年裏，似乎說起過皮黃戲的文學價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見。他可也沒說皮黃可以成爲新體詩。而從歷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黃乃近百年一般通行的樂曲，確乎應成爲新體詩；若牠們真如我所猜，沒有具備着這種資格，那麼，文學史上便將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黃既與新體詩無干，因此論現在的新詩的，才都向歌謠裏尋找牠的源頭。在近幾年裏，歌謠的研究，已「附庸蔚爲大國」了。但歌謠的音樂太簡單，詞句也不免幼稚，拿牠們做新詩的參考則可，拿牠們做新詩的源頭

，或模範，我以為是不夠的。說最初的詩就是歌謠，或說一切詩淵源於歌謠，是不錯的。但初期的詩直接出於歌謠，後來的便各有所因，歌謠只是遠祖罷了。至於現在的新詩，初時大部分出於詞曲，嘗試集是最顯著的例子。以後的作者，則似乎受西洋影響的多。所謂西洋影響，內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形式方面是自由詩體。這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換上風花雪月，傷春悲秋那些老調；只剩自由詩體存留着。直到去年，聞一多，徐志摩諸先生刊行詩鐫，才正式反對這自由詩體，而代以格律詩體，也是西洋貨色。此外，翻譯的日本的小詩，那洒脫的趣味與短小的詩形也給了不少的影響；但來來所存的，也只有形式的了。所以新詩徹頭徹尾受着外國的影響，與皮黃和歌謠同樣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後內容方面雖復歸於老調，但也只是舊來詩，詞，曲裏的東西，與皮黃和歌謠仍然無關的。

新詩之沒有樂曲的基礎，已是顯然。他是不是因此

失了成立的根據？有人許要說，「是的」。但我想文學史的演進，到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變」的狀態吧。牠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許要讓新詩給填上。新詩即以形式論，無韻也好，有韻也好，自由體也好，格律體也好，總已給我們增出許多表現自己的方法。我們可以用牠們表現舊來詩，詞，曲所不能表現的，複雜的現代生活；我們更希望用牠們去創造我們的新生活。所以新詩也許不能打倒舊來一切詩，詞，曲，但牠至少總該能佔着與牠們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現在是這樣相信著的。可是，詩的樂曲的基礎，到底不容忽略過去；因為從歷史上說，從本質上說，詩與音樂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新詩若有了樂曲的基礎，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牠本身的藝術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幫助。

有人說，新詩（無論無韻，有韻，自由體，格律體）不便吟誦，也是冷落之一因。這或者是的。爲什麼新詩不便吟誦？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組織，或由于韻的不協調，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誦，或竟由于不願吟誦之成見（

新詩不能吟誦，不足吟誦，或不必吟誦，之成見。因前兩種緣故，才有人不願胡適之先生「自然音節」說，而去試創新律，如田漢，陸志韋，徐志摩諸先生都是，平伯在詩的新律（我們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詩鐫出版，這新律運動便有了一定的標準，而且想造成風氣了。詩鐫裡頗有幾篇文說明這種新律，但我覺朱湘先生「志摩的詩」一文（去年小說月報一月號）或者更具體些，雖然此文並非爲解釋新律而作。這時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讀詩會的提議；我可以說，這是從後兩種緣故而來的。他在詩鐫上寫了一篇小文，說明讀詩的重要；並定下日子與地方，請人去聽他讀自己的詩。屆期他「臨時回戲」，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後，我卻聽見他的誦讀了。他是用舊戲裏丑角的某種道白的調子（我說不清這種調子什麼戲裏有）讀的；那是一種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調子。他讀了自己的兩首詩，都用這種調子。我想利用這種調子，或舊戲裏，大鼓書裏其他調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僅用一種調子去讀

一切的新詩，怕總是不合式的。這讀新詩的事，實甚要；即使沒有下文所要說的唱新詩那樣要重，也不能增進一般人誦讀新詩的興味，與舊來的「吟誦」不同的興味，並改進新詩本身的藝術的。可惜後來雖還有人提及此事（見現代評論），而讀詩會始終沒有實現。自然，這也是一種藝術，不是人人能討好的。

現在我要說唱新詩。將新詩譜爲樂曲，並實地去唱，據我所知，直到目下，還只有趙元任先生一人。好幾年前，他的國語留聲機片課本中，便有了新詩的樂譜；我曾從那片子上，聽過鄭振鐸先生是少年一首詩。前年北來至今，又三次聽到趙先生的自彈自唱，都是新詩。這三回的印象雖也還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這回他在一個近千人的會場裏，唱了兩首新詩；彈琴的是另一個人。這或因他不用分心彈琴之故，或因樂曲之故，或因原詩之故：他唱的確乎是與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劉半農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韻。唱第一首裏「如何教我不想他」那疊句，他用

了各不相同的調子；這樣，每一疊句便能與其上各句的情韻密合無間了。唱第二首裏寫海濤的句子，他使用洶湧澎湃的聲音，使人悚然動念；到了意黃昏的句子，他的聲音卻又平靜下去，我們只覺悄悄的，如晚風吹在臉上。這兩首詩，因了趙先生的一唱，在我們心裏增加了某種價值，是無疑的。散會後，有人和我說，「趙先生這回唱，增進新詩的價值不少」，這是不錯的。

我因此想到，我們得多有趙先生這樣人，得多有這樣的樂譜與唱奏。這種新樂曲即使暫時不能像皮黃一般普及於民衆，但普及於新生社會和知識階級，是並不難的。那時新詩便有了音樂的基礎；牠的價值也便可漸漸確定，成爲文學的正體了。但是單有詩篇的唱奏，我想還不夠的；我們得有些白話的歌劇，好好地寫下來，好好地演起來，那是更有力的影響，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衆，也未可知。說起白話的歌劇，我們極容易想起葡萄仙子；牠已有了很大的勢力，在小學校裏和一部分知識階級的觀衆裏。我慚愧還沒有

讀過這個劇本；但在北京會一見牠的上演，覺得確是很好。不過一個歌劇，決不能撐持我們的局面；況且葡萄仙子是兒童的歌劇，我們還得有我們自己的。這種歌劇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證。

以上說的新詩的音樂化，實在是西洋音樂化（作曲的雖是中國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這就是實際情形立論；本來新詩大部分是西洋的影響，西洋音樂化，於牠是很自然的。至於皮黃，本身雖不能成爲新體詩，牠的音樂，還有大鼓書的音樂，（據我所知，大鼓書似有兩種唱法，——其細微的派別，我可不管，也說不出——像白雲鵬，雖然是唱，實在可說是念白，與別人的不同。我上文論讀詩可利用大鼓調，便是指此，寫到這裡，我想大鼓書的文句似比皮黃繁複，牠的本身也許可以變成新體詩，與現在的新詩同去填文學史上那般空白，固不僅音調可供我們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來唱新詩或新的白話歌劇，我還不能說；我希望有人試一試——若有成績，就讓這皮黃音樂化成大鼓書音樂化，與那

西洋音樂化並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十月十一日。

扣絲雜感

魯迅

以下，是因爲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沈鐘。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裏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我想和義演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舖裏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二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待而知。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

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爲裏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并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一本是託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爲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里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着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面是裸裸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葵，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閒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

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爲這一條麼？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錘或鶴嘴，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面「嚴辦！嚴辦！」這纔庶幾免於罪戾。至于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閒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爲視之儼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于是討厭，于是生氣，于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于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趁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着某郵局因爲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燬。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彷彿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

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臺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舖裏，我却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彿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澈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牀上吸煙捲——彩鳳牌。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纔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

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過激，過激便近于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于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于必須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于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于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于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

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也許未必長久如此。因為這種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着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名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名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于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却並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面臉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

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刑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于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直要待到蔡松坡雲南起義，這纔阿呀一聲，連一連喫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于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

然而終于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于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于有一羣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于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于南方，彷彿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里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彷彿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

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刑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乎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話，也不是好事情。蓋在革命已成將成之時，之地而說不吉利話，即可以說是頗有近乎「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于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讀巴黎通信

天行

同是這樣國度的國民，同是走進「主人翁」的家鄉。無庸多話，放大肚皮裝氣，閉著眼睛走路，垂下耳朵聽罵。我相信，國界是「難」打破，我却不願意死守著這界限。

這正是現在鎮日價驚天動地的喧嚷著要打倒的「帝國主義者」的手段，把牢了「國」的名義，塗炭國民來侵略人家，吸收利益去肥飽自己。除了這些野心的怪物，其餘的人誰究竟有多少過不過的仇恨，要在這個「國」

字上發生關係？就是那些痴心信從的人，也都是莫名其妙的一要』這樣的罷了。

如果人類的重要是在智識的增長，在生活的改進；那麼自然明白了「國」是無關得失的，可是因為有了彼此，分出這不同的國度，也就成功難打破的界限。那末，受刺激時的我發生的抵抗，可以算是「國家觀念」。但是同時，我却不願如此的也教別人有這樣的反感。如若循環報復，我覺得是無謂的很。國家思想，我是有的；國家主義，我是恕不戀愛。

生在自己的國家，自然謀這地方的福利。除了你不在是謀這地方的福利，或是爲了自己，或是賣了羣衆，才應該標榜出個「我是愛國的」牌號。

爲什麼非洲的黑人不是人？主人翁才這般想，他們有色人種是低賤的。然而羅素杜威一班的洋書生又何嘗這樣說的？所以，我受到刺激時，總認爲是些低能的愚蠢漢的無禮。反省過來，只恨自家不如人家，國內表現給人家看的，和國外表現給人家看的都是些不掙氣的

東西！這是我有的「自慚形穢」的國家觀念。同樣，看穿人家也不過爾耳。

要掙氣的究竟還是掃除國家的垢污爲要緊。我想不必痴痴的要戀愛什麼「國家主義」，才算是掙氣。名詞往往誤人。而今許多垢污，許多病菌，在我們國家裏孳生，都是「重名輕實」的教訓。

彭基相先生寄時事新報青光一篇通信，讀後頗有感慨，因爲時地的境况不免相似，便胡亂寫下一點。彭先生信剪錄附後；未得其同意，還請原諒。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午正，朝鮮故光化門外寓樓。

附巴黎通信

記者先生：

（上略）……在民國十四年夏間，友人聞一多余上沅新自美國回來，他們竟同國家主義發生戀愛了。據聞先生告訴我，他是因在外國受了極大刺激所致；所以他鼓吹他的中國魂了！我那時絲毫並未感

到，因此對他們不免稍有懷疑。現在到了自己的頭上來了，我雖仍未進什麼黨什麼派，但是住在外國，國家思想多少總免不了要來刺激你。我絕不是無病呻吟，現在先舉兩個極小的事體告訴諸位。

有一天在講堂上課，教員叫一個美國人到黑板上去寫練習。這個美國人無意把「法國人」，這個字的頭一個字母F忘了沒有大寫，那位教員就氣了說F應當大寫；卽是如「美國人」的A，「英國人」的E，「日本人」的J，都要大寫；但他下面接着說，卽是「中國人」與非洲的黑人，頭一個字母也要大寫。諸位大約都知道法國人待外國人比較英美要好一點；然而他們往往在無意識中說出來的一句話，真叫你不能忍受！

第二件事就是當南京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後來接到美國的朋友來信，說是有人瘋了，我們在此地幸而還沒有發瘋；但我在這一天早晨乘電車到學校去；車上有一個警察剛靠我一塊站着。我因爲太

擠，他那兒有一點空地，我就說，「對不起，你肯不肯稍爲向那個空地多去一點。」他將兩手向我一推，臉上帶着很兇的樣子向我說：「你們中國人現在不是又像拳匪一樣，來仇殺我們歐洲人嗎？現在我們讓你站在此地就是文明待你們了，還要多站！向那兒站？」我當時也就不理他完事。這都是很小的事。然而處處都叫你不能忍受。至於他們的書本上常有中國人是野蠻，黃種人是劣種；報紙上差不多天天在這兒不是譏笑就是謾罵。例如徐州會議，在一個月以後，方有巴黎一個報紙載出一點；平常不是載汪陰中國人砲擊外國船，就是載雲南又有大騷亂了。前幾天英國路透社又宣傳南京怎樣爲北方所敗，並且說孫傳芳已佔領通州了，不久就到上海。又說馮玉祥反對蔣介石，共產黨佔領杭州，……諸位要不相信，我的報紙都存在這兒，可以做證據。英國路透社又宣傳南京政府如何加重稅，入口稅加多少，奢侈品加多少，烟又變成專賣，……

其實我們來查一查法國對於入口稅奢侈品及外國烟所徵收的稅，而後我們知道，南京政府所加的稅，真是輕而又輕。這幾天大約是南京軍隊打勝了，（諸位看見我的信時，可以計算看，今天是八月七日。）自從八月四日起，法國報紙沒一個報紙載中國事。因爲南京打勝了，他們就不載了；因爲他們仍盼望着他們的孝子順孫，再來統制中國好讓他們來宰割。今天巴黎的「時報」(Le Journal)載有一個社論，譏刺中國政治不能用常軌的法式來制斷。他說中國政治，是軍閥地盤；政客野心；與個人私利所做成的，又說中國的政治是因軍事而定的。

以後有空，當再與諸君一談。

彭基相寄自巴黎，八月七日。

隨感錄

六七 「公理」之所在 魯迅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

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這是我去年說過的話，而今年確也還是如此。然而我雖然一無所有，尋求是還在尋求的，正如今個窮光棍，大抵不會忘記銀錢一樣。

話也還沒有說完。今年，我竟發見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說發見，只可以說證實。北京中央公園裏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麼？——Yes，就是這個。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

「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槍砲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現代評論的一千元津貼事件，我一向沒有插過嘴，而「主將」也將我拉在裏面，亂罵一通，——大約以為我是「首領」之故罷。橫豎說也被罵，不說也被罵，我就回敬一杯，問問你們所自稱為「現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變計，另外運動，接受了新的戰勝者的津貼沒有？

還有一問，是：「公理」幾塊錢一斤？

六八·可惡罪 魯迅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只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喫點苦罷，就

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只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纔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纔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九，十四。)

六九 「意表之外」

魯迅

有恆先生在北新週刊上詫異我為什麼不說話，我已經去信公開答覆了。還有一層沒有說。這也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的難感常不免於罵。但今年發見了，我的罵對於

被罵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來做廣告，顯而易見，不消說。還有：——

1. 天下以我為可惡者多，所以有一個被我所罵的人要去運動一個以我為可惡的人，只要攤出我的難感來，便可以做他們的「蘭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咱們一夥兒」。

2. 假如有一個人辦一件事，自然是不會好的。但我一開口，他却可以歸罪於我了。譬如辦學校罷，教員請不到，便說：這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學生鬧一點小亂子罷，又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他倒乾乾淨淨。

我又不學耶穌，何苦替別人來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也許後來還要開開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說過的「主將」之類以外，新的都不再說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個人」，「某學者」，「某教授」，「A」，「某君」。這麼一來，他利用的時候便至少總得費力一點，先須加以說明道：「這所謂『一個人』，就——就是我！」

你以為「罵」決非好東西罷，于有些人還是有利的。人類究竟是可怕的東西。就是能夠咬死人的毒蛇，商人們也會將牠浸在酒裏，什麼「三蛇酒」，「五蛇酒」，去賣錢。

這種辦法實在比「交戰」厲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寫雜感。但再來一回罷，寫「不敢寫雜感」的雜感。

我來了！看我！我敗了

七〇 「新時代」的避債法 魯迅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纔知道無須。在「新時代」裏，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

你備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呵！

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爲什麼呢？因爲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爲什麼呢？因爲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爲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

于是乎要算賬了。不得了，這麼雄厚的資本，還不

夠買一個靈魂麼？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的罪惡。想不「身敗名裂」麼，只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着這許多賬簿，對於「身敗名裂」竟懷着這樣天大的恐慌。

于是乎又得了新「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只看見物質的。

(九，十四。)

七一 旅漢雜感

啞水

在重慶時，今天要打倒這個帝國主義，明天要打倒那個帝國主義，從早到晚，鬧得筋疲力倦，我老婆常常

說我自尋麻煩，——確實是自尋麻煩。今年三月三十一日幸蒙我革命的劉湘軍長鳴槍幾排，把我送出夔門，不然真要在重慶累死了。旅居漢口，百無聊賴，我生成是驢子性，沒有磨推，便擦耳踢蹄地老不舒服。於是找些事來做，兩渡洞庭，一遊君山，弔湘妃塚，遊松坡墓，這樣地亦混去了不少的時間。邇者閒居滬上，獨自炊食，仍願過我花兒月兒的生活，這大概與黨國大事無干吧。茲有旅漢雜感數則，抄寄語絲，我不過有感而已，並不是竊議時政也，合併聲明。

(一) 政躬違和

任何各地政府的當局，負國家重任，都該珍重貴體，以料理國家大事。但是地位愈高的人，多半愛生病，或者是「食少事煩」的緣故吧？北京的當局們，一旦政躬違和，則上西山湯山或天津。武漢的當局有病，則上牯嶺，或雞公山。南京的當局有病，則赴上海或赴西湖。政府雖有北京，南京，和武漢之不同，而當局者之愛生病則一也。

(二) 左右做人難

左右做人難，在今日的武漢，成爲很重大的問題了。溯自武漢「反共」以來，厲行清查共黨；一般左派的人，從前深恐蒙右派的嫌疑，說話做事，比共黨還左，現在呢？這個有西披嫌疑，那個亦有西披嫌疑，弄得他們趕快登報聲明，如喪考妣似的說某某是「純粹國民黨員」，一點兒也不敢左了。可是南京電桿上貼有「打倒汪精衛」的標語，漢口的總工會又在馬路上掛一幅兩丈長的橫街標語，大書「打倒西山會議派」，這樣一來，有西披嫌疑的「前左派」，又不敢右了。許多朋友一會面，都是先嘆一聲，「唉，沒辦法」。左乎？右乎？這就叫左右做人難了。

九月二十五日，於上海。

編者案，啞水先生還有兩條講二K博士的雜感，恕我把牠略去了，因爲我覺得這是那些所謂新興官吏階級的常態，如駱駝之必腫背，不足深怪。他們平日自稱什麼無產階級，像煞有介事地講革命，及

至皮帶加身，高陞爲委員主任之流，便又帶衛兵，坐汽車，儼然是貴人，把原來的有產階級根性完全發露了。說是醜陋也確是醜陋，但我想也不值得怎麼說，我們如想一想中國人的這種根性的根基之深固與其歷史之久遠，或者是不足怪而且還有點是當然的。啞水先生又告訴我們劉湘督辦怎樣剷除漆樹芬等一千赤黨，其功殊不小，今始榮任南京軍事委員，酬勳未免稍薄等情，我也無異議，但是現在不擬發表，尚祈鑒原。因爲我們爲免於有「色彩」起見，關於寧派的話擬竭力擲節，這個年頭兒，良如貴雜感所云「不敢不右」耳。

民國十六年國慶日，於京師右安書屋。

七二 好對聯

豈明先生：

我們貴邑有一位L先生，著名之大「教育家」也；他嘗刻兩方圖章，一曰「曾經兩渡太平洋」，一曰「社會之僕」。昨天他的「季女出閣」，據說是用最新禮式的，余因往參觀，雖然未被束請，禮式究竟怎樣新法，我且

不說，祇是有幾副楹聯，這位教育家自撰自書的，却想介紹一下：

必敬必戒毋違夫子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擇婿亦何難但教讀書做人夫夫婦婦便堪偕老

事姑殊不易須學下聲柔色婆婆姐姐總可承歡

慨自歐化東漸，女德淪亡，「夫婦反目」，「婦姑勃谿」者，若汗牛之充棟。這幾副聯，提倡婦道，大足以正

女心而挽頹風，與牛聖人的婦見舅姑說同是「天地間之至文」，而為青年女子所不可不讀者也。素仰先生「關心世道」，故特錄呈，尚祈登諸語絲，藉廣流傳，「至級公誼」。

盧子青，九，二二，於新會。

七三 蒙氏教育法序

豈明

中國人很有點奇怪，他把自己的性命與兒童都一樣地看得不大值錢。前清時子弟讀書，目的自然是在正路功名，第一重要的是學帖括，應科舉，等到屢試不售，不得不變換方向，改為學幕或學生意，萬一連這個也弄不好，於是便走最後一著——去行醫，坐館教書！這並不是誇張的話，在民國四五年頃，吾鄉六七塊錢一月的

小學教師裏，失業的雜貨舖夥計的數目實在不會比不第秀才少，以前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鄉間的醫生大都還是在談五行氣化，用「錫」一塊做藥引，教師雖然不至於完全「都都平丈我」，但依舊是登皋比秉戒尺氣象，其不「誤人子弟」者蓋幾希的了：中國的死亡率之高我們如將一半歸功於那許多所謂功俸良將的大夫們，那麼低能率之高也就不能不說是那些不知兒童為何物的教師諸子的功勞了。

兒童這樣東西原是古已有之的，但歷來似乎都不知道，雖然牠們終日在大人們的眼前，甚至如幾道嚴復先生所說，充滿街巷，輾轉於車塵馬迹間，直至很近的近世，而且還在夷地，這纔被人家發見，原來世上有一種所謂兒童的物事，與人及女人的發見並稱為三大發見之一，這種發見本來與一切的發見一樣，並不怎麼希奇，只是把原來就在那里就是如此的東西看見了而已，但是這一看見不打緊，却不免因此總發生了若干的大小影響。少數的明智的教育家與學者承認兒童是靈長類的一種小動物，並不是縮小了的成人，把他另眼看待，其結果是發生了幼稚園的制度與兒童學的研究。多謝人類的保守

性，不知是從倦怠呢還是從愚蠢出來的，不准社會上發現過激的變化，使父師還得保持他們平日的威嚴，於是成功一種捏捏放放的半智半愚的教育，雖然在我們將子女當作家畜看的中國已經覺得新的有點可怕了。兒童明明是駒或犢似的 *Live stock*，教師只是看管的廝養罷了，（這是所以稱爲 *Pedagogue = Paideutikos* 的緣故，可見是與古典時代的意見很合的，）現在却忽然改變，說小兒是一粒花木的種子，要人去順從了他的天性加以培養，不准去妄動牠，舊日的「看鴨」先生現今非變爲郭橐駝一流的園藝家不可了。道統治下的中國人不能容易收納或了解這種意思與辦法，正是很自然而無足怪的。

近來義大利的蒙德梭利女士又發表了她的教育法，最初介紹的彷彿記得是錢稻孫先生，掲載在教育部月刊上面。雖然對於兒童的空想方面稍欠注意，如英國加伐威爾教授也曾說及，牠的「兒童之家」的教育法總是極好的，於活動及感覺各方面的練習實在最適於實用，但不知怎地我們的好談實用主義的教育家也不很注意，大約至少有十足十年不聽見社會上說起蒙氏教育法的名字了。日前張雪門先生拿了他所編的一本書來給我看，這

纔又令我記了起來。張先生的愛小孩與研究學問是有名的；你去問孔德南分校的學生那位「外面的老先生」，他們是無不佩服而且喜歡的，張先生的幼稚園研究又是已經很有成績。今年暑假期間，張先生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整整地關了一個夏天，後來開出門來，手裏便拿着這一卷書，即是蒙氏教育法的研究。這令我發生「三種感想」：第一是我們白過了這個暑假，什麼文字都沒有能做，相形之下不免慚愧。第二是對於張先生的小不敬，在現今這個中國，兒童的運命只配由落第文童失業店夥去管的時代，只要有一根部頒戒尺便足了吾事，而張先生講福祿貝爾不夠，還要來談蒙德梭利，豈不叫人笑他迂闊？第三，話又說了回來，蒙氏教育法到底是很好

的，可以說是兒童界的福音，特別是在此刻現在的中國，張先生肯這樣刻苦地把牠介紹提倡，無論被人家笑爲迂闊也好不理也好，總之是很有意義，值得佩服的事：所以這第三點便是表示我佩服之至意了。

民國十六年十月四日，即丁卯重九日，於北京內右四區，

幼婦雲雀錄

斯文生

六 浙江省政府教育廳整頓學風通令（九月十

七日時事新報）

查學校爲造就人才之所，教師爲一般學生模範。爲教師者誠能學萃品端，和衷共濟，祇知盡其天職，則學生必潛移默化，蹈矩循規，自無意外之行動；倘教職各員互相傾軋，使學生有隙可乘，則不良份子得以肆其伎倆，盡惑於其間，無知青年樂爲盲從，卒至學校之名譽掃地，學生之品格毫無，而挑撥是非者尙坐觀成敗，自以爲得計，究之水落石出，而以叵測居心者終爲人所共棄，天道好還，豈待智者而知哉？本廳長諄諄懇懇，不憚詳爲告誡者，惟願自今以往，教職員視同事如昆仲，視學生如子姪，一般學生亦視教員如父兄而惟命是從，不宜少存芥蒂於其間，如是則學校必日見起色，又何風潮之有哉？除分行外，合亟令飭各該校長暨各該縣長，一體遵照，此令。

文生謹案，此令就文章上說，中分「豈待智者而知」與「又何風潮之有」兩大比，前比以潛移默

化及有隙可乘對立，後比又以子姪父兄並提，格局謹嚴，發揮透澈，可爲文牘名作，綽有帖括遺風。就思路上說，中含三大思想，悉屬上好國粹，茲分別言之。其一，天道好還，乃道教之神髓，讀此一語，勝于朗誦太上感應篇三十六遍。其二，唯命是從，乃儒教之精華，即父爲子綱之意也，在此三綱與三愛同時掃興之時，得此提唱，如聞晨鐘，發人深省。其三，如昆仲，如子姪，如父兄，乃學校即家庭說之發揮，承前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先生之緒，繼絕續斷，發潛德之幽光，發曠振聵，維人心與世道，誠不愧爲劉哲教長所謂教育界之家長也。懿歟！休哉！孰謂東南陸沉，聖道將喪耶？承大一君以此令見示，可以證明其誣矣。大一君又以下開各項相示，皆有關聖道之好消息也，併錄于此以誌喜，喜浙江之復歸于聖化也，敬賀，敬賀！

一，奉化孔廟前改爲中山紀念廳，現該縣縣黨部已函縣政府歸還，並請保存舊觀。

二，杭州市公安局章局長俯順輿情，取消禁止婦女剪髮令。